

黑白·主鼓

——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

刘望龄



湖北教育出版社

黑白·主鼓

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

(1866——1911)

刘望龄

黑血·金鼓
——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
刘望龄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25印张 7插页 384 000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51—0616—1/K·15

定价：7.50元

前 言

近十年来，近代中国报刊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这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查阅以往的研究状况，已出版的论著和史料实在太少，难怪新闻史家方汉奇先生大发感慨地说：“解放以来，新闻学的著作出版得很少，报刊史方面的著作则更少。广大新闻工作者和想了解一点我国报刊历史的人，都苦于无书可读。”^①方先生是针对近代中国报刊史而言的，既然近代主要报刊尚且研究得不够，至于对地方报刊史的探索恐怕就更是一个薄弱环节了，近代湖北报刊就类似这种情况。建国以前，已出版的湖北报刊史论著仅有管雪斋的《武汉新闻事业》（1936）、日本记者内田佐和吉的《武汉的文化机关史》（1942）、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1943）等数种，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只间有涉及。建国以后，还没有一本湖北新闻报刊史著、史料出版，只是在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台湾苏云峰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卷》中有所论及。在这些论著中，由于报刊史料和研究成果的限制，大多较为简略，语焉不详，难以反映湖北报业的全貌；所及报刊种数也十分有限，如内田所记为20余种，戈著31种，蔡著39种，管著60种，苏著66种，与近代湖北实际创刊的300种左右之总数相去甚远，有的著作还出现不少错误。这些论著固然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要想编写出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切近历史真实的近代湖北报刊史，仍然还得从发掘、整理报刊史料着手。本书的编写，力图弥补上述之不足，为新闻学、历史学研究工作者和有关读者，提供一部报刊种数较多、史料较为丰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后记。

富、考订较为翔实的可供翻阅、征引的工具书、资料书。

本书以“黑血·金鼓”命名，期以较为形象的语言反映湖北舆论的特点和功用。“黑血”体现如火如荼的革命战斗历程，“金鼓”表彰启迪民智的历史作用。

全书辑录湖北报刊计191种，其中在本地出版的为184种，在外地出版而由湖北籍人士主办并以湖北为主要宣传对象的为7种。此外，还简要辑录有湖北籍人士在国内外参与编辑的报刊16种。从所辑数量来讲，已大大超出前此有关论著所及之总数。

本书辑录的时限，起于1866年1月湖北第一家报馆即英文《汉口时报》的创办，止于1919年“五四运动”，涵盖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整个时期。

所辑资料，按日叙事。以新闻史资料为主体，凡报刊言论、发刊停刊年月、经理编辑人氏、设馆地点、版面编排、副刊插画、栏目部类、资金设备、组织机构、稿酬刊例、广告发行，以及新闻团体、通讯机关、报律条例等等，均尽量收录。为了保存新闻资料，对各报社论、时评，选录尤多。此外，还注意了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地方史诸学科的需要，多所引录，力求反映近代湖北社会的总体面貌。

本书首次公布有日本外务省有关武汉报业内情的原始档案20件，这是当年日本驻汉口总领事瀚川浅之进、永洗久、小野幸吉、渡边省三、芳泽谦吉、高桥新治、川越茂等人向日本政府呈报的绝密情报，具体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插手武汉报业、进行文化渗透的种种阴谋活动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争斗，也有助于了解武汉报界的复杂情况，解开一些历史悬案。上述档案资料是日本友人小野信尔教授经过多方查找，于1981年惠赐与编者的，是十分难得的珍贵史料。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有关报刊创办的历史、政治背景和经理、编辑、编辑的个人经历和办报活动，特撰写“报人小传”60余

篇，附刊于有关内容之后，以※符号注出。

为便于检索，书后附录有《湖北报刊索引》、《湖北报人（附督抚、督军）小传检索》两则，均按笔画顺序排列。另附《征引书报刊目》一篇。

所辑资料之文字，大多经过重新标校，凡能判定的错字、漏字、模糊不清之字，均予注出，用（ ）标示；凡无法判定或原报缺漏者，以□标明。原文之作者自注或说明，一律用〔 〕标出。所辑资料，按日排列，日期相同者，以▲相续。凡用△所标之资料，均为原始资料所有，与日期无关。

值得指出的是，《黑血·金鼓》一书，仍然是一部不甚完整、不甚系统的资料长编。就客观原因而言，由于原报大多散佚，无从查考；幸存者也支离破碎，难得齐全；有些报纸虽确知尚存，因种种限制而无从查阅，从而造成本书无可弥补的缺陷。就主观原因而言，由于编者知识浅陋，涉猎资料有限，尤对一些杂志未能一一查阅，造成挂一漏万的不足；在材料筛选方面也不无偏颇之处。所有这些，目前已无法补救，亟望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料线索，共同发掘，予以完善。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编者在搜集资料和整理过程中，得到众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像湮没数十年之久的《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原文，是湘潭大学崇汉玺副教授从当年《时报》的新闻报道中查获而主动提供的；日本外务省档案“新闻”类资料，是日本学者小野信尔教授费心查找并亲自带来武汉而赐予我的；开封市私家珍藏有大量武汉报纸的信息，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王天奖研究员最早传递的；北京大学馆藏湖北报刊目录，是我的业师章开沅教授亲自抄录与我的。正是依据上述线索，才逐步摸清湖北报刊的底细，发掘出一批极为珍贵的新闻史料。此外，开封市图书馆萧凤柱老先生、武汉市图书馆姚海泉先生、北京大学图书馆谭名声先生，在资料借阅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甚而在晚上单

独为编者开放，这种对读者体贴入微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还有，上海历史研究所汤志钧、吴乾兑、周元高、吴桂龙诸先生，湖南社会科学院刘泱泱先生，文物出版社俞筱尧先生，湖北日报新闻史研究室张醒钟先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陈楨连馆长等等师友，为联系查阅、翻拍照片、复印资料四出奔走，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我校历史研究所赵军、罗福惠等同志，在百忙中代为翻译日文资料。湖北教育出版社为本书提供了出版的方便，并对书稿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由于得到同志们的帮助，才使本书顺利成篇，现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谨向诸位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还参考利用了不少近人研究成果，恕未一一注出，特此说明并顺此表示感谢。

编 者

1990年1月

序

在中外历史上，近代化的进程大多经历过经济领域的工业革命、政治领域的民主革命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黑血革命”，三者的革命内涵虽有所不同但又相互联系，诚如毛泽东所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近代报刊是思想文化的重要传播工具，是舆论之母，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革命事业的成败和发展。因此，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团都十分重视舆论的宣传，对于报刊或自行组创，或操纵控取，或收买利用，无不拥有各自的言论机关。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也竞相创设，精心经营，进行文化渗透。由于报刊所具有的时代与阶级的特点，有助于透视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成为研究社会、研究阶级、研究社团、研究革命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历史资料。

近代湖北的历史进程，较诸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稍迟，但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向内陆深入和洋务、“新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粤汉铁路的修筑，武汉迅速成为全国的中心重镇，地位日益显要。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湖北报刊逐渐兴起，跃居全国先进之列。它为传播近代西方文明，介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呼号救亡维新，鼓吹反清革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为武昌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此，孙中山、梁启超等作了充分的肯定。孙中山认为：“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梁启超则谓：“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数

吹之功最高，此天下之公言也。……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也。湖北革命党人更是以此为荣，高唱“辛亥革命是报馆鼓吹起来的”，报纸有如“黑血”“金鼓”和“警钟”“木铎”，“胜过十万毛瑟”。报刊所起到的“精神变物质”的重大功用，在武昌起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而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湖北报业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比较曲折的道路，从本书所能辑录到的191种报刊进行分类，其基本情况有如下表：

右表统计了自1866～1919年“五四”运动前54年间创办的191种报刊，其中外国人主办的为29家（内含英美23家、日本6家、德国2家），官办25家（一度从日本人手中赎回官办的《汉报》与《汉口日报》2家未统计在内），民办135家。如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为分界，则清末46年（1866～1911）总共创办有报刊103家，其中外人办27家、官办14家、民办62家；民国初期8年间（1911年10月～1919年5月）兴办88家，其中外人办4家、

创刊时间	创办 家数	其 中		
		外人办	官办	民办
1866	1	1		
1872	1	1		
1873	1			1
1875	1	1		
1880	2	2		
1883	1	1		
1885	1	1		
1887	1	1		
1888	1	1		
1893	2	2		
1898	2		1	1
1899	1		1	
1901	1		1	
1903	7	2	1	4

官办11家、民办73家。

清末年均创办为2.2家，

民初年均创办为11家，

民初的发展速度为清末的5倍。1908年是清末

创办报刊最多的一年，

计17家；1912年则是民

初发刊的最高年份，计

31家。如果进行细致一

点的划分，则可看出：

在1898年戊戌变法以前

的30余年间，湖北创办

的报刊不多，间断发

展，外人办的报刊占绝

对统治地位，除民办报

纸1家外，其余11家全

部控制在帝国主义手

里。19世纪末20世纪

初，官报开始发展，

1905年以前已达7家之

多。1905~1911年民办

报纸迅速兴起，达54

家。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民报进一步得到发展，达73家，占当

时所办家数的近90%，而1912、1916年兴办有48家，呈现出急起

急落的特点。有关上述四个阶段的基本情况，分述如下：

（一）19世纪60~90年代的帝国主义独占阶段。随着1862年

1904	5	2	2	2
1905	13	3	2	8
1906	13	3	1	9
1907	10	1	2	7
1908	17	3		14
1909	6			6
1910	8	1	4	3
1911	12 ^①	2	2	8
1912	31	1	5	25
1913	13		2	11
1914	4			4
1915	3			3
1916	17		2	15
1917	7			7
1918	6	2		4
1919	3			3
小计	191	31	25	135

① 10月10日武昌起义前创办8家，武昌起义后创办4家。

汉口对外开埠，帝国主义各国纷起在汉口设立租界，开设银行洋行，创办工厂航运。与此同时，大批间谍特务和20多个教派的传教士涌入武汉和湖北各属，他们设堂传教，广泛搜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情报，武汉迅即成为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陆的桥头堡。为了传教和开辟与中国士民的联系渠道，侵略者纷纷创办舆论机关，加强殖民宣传。最早在武汉办报的是英美帝国主义，1866年他们首起发行英文《汉口时报》，随后又相继创办有《谈道新编》、《开风报》、《昭文日报》、《新民报》、《武汉近事编》、《英格兰圣经会报》、《益文月报》、《中国传教士》、《字林汉报》等多种。日本也于1896年从中国手中接办《汉报》，在湖北建立起第一所文化侵略机关。

在此期间，湖北当局未兴办任何报纸，民办报馆则仅有《昭文新报》一家，艾小梅经营，刊于1872年。但由于“人情未习”，无人购读，经营数月即倒闭停办。此后20年，无人再行兴办，湖北报坛被帝国主义前后独霸长达30余年之久。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官府把持阶段。湖北自1889年张之洞督理以来，洋务企业、“湖北新政”获得长足发展，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枪炮厂、炼铁厂、大冶铁矿、纱布丝麻四局和其他民用企业接踵创办；各类新式学堂普遍兴建，大批学生选派洋，新式军队开始招募与编练，维新、革命思潮开始传播，湖北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动，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为适应时代的需要，湖北当局也日益重视新闻事业的建设，用以传播西方先进生产技术，遏制革命潮流。1898年，张之洞特委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筹办《正学报》，以“正人心”、“息邪波”为主旨，作为官府的言论机关，虽未果行，但随后则陆续创办有《湖北商务报》（1899）、《农学报》（1900）、《湖北学报》（1903）、《蚕学月报》（1904）、《湖北官报》、《湖北教育官报》（1905）、《公论新报》（1906）、《农工商报》、《两湖官报》（1907）

等种，凡政、学、农、商各个领域的舆论宣传，几乎全部控制在官府手里。

在这一阶段，帝国主义报纸也大大加强，特别注重开辟中文版，直接参预中国的政治斗争。1903年德国创办英文《汉口中西报》，次年增设中文版。1904年英美发行英文《楚报》，次年发行副刊中文《楚报》，还创办有《武汉小报》、《中国教会报》等多种。日本自1900年被迫将《汉报》交出以后，复组设《汉皋日日新闻》（1905）和《汉口日报》（1907）两种日文报纸，为与英美抗争，还积极要求日本政府批准开辟中文版。

与此同时，民办报纸不断兴办，1898~1905年间发行15种，但绝大多数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报和消闲小报、花报，如商办《汉口中西报》、《工商日报》和《汉口风月报》、《汉口小报》、《新小报》等。革命党人虽然于1903年在日本创办有《湖北学生界》，但迄至1907年尚未在湖北本地创办任何革命宣传机关，他们只能借充任官报、外报、商报主笔的有利条件，发表一些进步言论。这一时期，东京、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苏报》、《申报》、《清议报》等等虽不断传入，但遭到官府的严厉查禁，只能在军学两界党人中暗地流传，播及范围和社会效果受到一定限制。

（三）1905~1911年武昌起义前的民报勃兴阶段。民报的兴起和发展，与湖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日益革命化直接相联系。湖北地方民族工业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创办，经过20年的努力，拥有工矿企业数十家，资本千万元以上，成为仅次于江浙、广东的经济繁荣之地。加之新式学堂和出国游学的不断发展，造就了一批具有新学新知的爱国志士，他们先后组织起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一批为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呼号反清革命的报刊急速兴起，多达50余家。主要报纸有

1908年的《江汉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女学日报》、《通俗白话报》，1909年的《汉口商务报》，1910年的《雄风报》、《政学日报》，1911年的《大江白话报》、《大江报》、《夏报》、《武汉白话新报》、《新鄂报》等。还有一批以鼓吹地方自治、催促宪政的立宪派报刊，如《教育新报》、《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趣报》、《宪政白话报》、《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等。革命报刊的普遍兴起，开创了舆论宣传的新局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从此广泛传播。湖北当局虽极力钳制和严厉取缔，但大势已去，无法遏抑。

（四）民国初年（1911～1919年“五四”运动前）新旧思潮激烈较量阶段。民国初年政党林立，政争纷繁，随着革命政权落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手里以后，一场民主与独裁、共和与专制的斗争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湖北在亲袁的官僚军阀黎元洪的统治下，斗争尤为激烈。作为政治喉舌的报纸杂志，明显打上政党、派系的烙印，革命与反革命双方，严厉对峙，笔战经年。

民国初8年间，新创报刊88种，民办报纸占绝对优势，计73种，官办和外国人办报纸仅15种。在民办报纸当中，除少数商报、小报、花报标榜“中立”、回避政治斗争以外，其余全部控制在各党各派手中。在革命派方面，有文学社的《民心报》；共进会的《震旦民报》；国民党的《大汉报》、《汉口民国日报》、《新汉报》、《大江报》、《中报》、《正心报》、《汉口民报》、《大中华日报》、《武汉新报》、《国民》杂志、《春秋报》等等。在专制派方面，有民社、共和党的《中华民国公报》、《群报》、《强国公报》、《共和党湖北支部杂志》；进步党的《新民国日报》、《国民新报》等等。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有自由党的《自由日报》；民主党的《共和民报》；青年会的《青年报》等等。官办的《湖北公报》、《战事日刊》等等，则是黎元洪所控制的工具，统率专制派各报。

民国初年的舆论斗争，激烈而残酷。在“二次革命”和洪宪帝制期间，几十家革命派报纸全被查封，见容而仅存的只有商办报纸三数家，为湖北有报以来所仅见。由于形势恶劣，报馆内部的分化也格外明显，如《中华民国公报》初为革命党人所控制，旋即成为民社、共和党的言论机关；具有民社色彩的《震旦民报》，由于黎元洪虐杀张振武，转而倒向国民党；共和党的《讨报》，因屡遭当局的排挤打击，愤而走向反袁。而革命派的《大汉报》、亲黎的《公论新报》、自诩“中立”的《汉口中西报》，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庇护，都与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关系暧昧。商办的《公论日报》则受到英美的保护。

从以上湖北报业的发展概况中大致可以看出，它发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长达40来年当中，民报始终处于极其微弱的地位，直至1908年革命报刊才开始兴起，其发展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沪、穗、京、津，甚至还赶不上湖南和四川一些内陆省市。可是，湖北报业仍然作出过重大贡献，并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第一，湖北是近代中国民办报纸的最早发源地之一。中国报刊最早创于1815年，即在澳门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此后陆续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兴起，但在五六十年内，各地报刊全部由外国人经营，而由中国人集资自办的报纸却出自湖北，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汉口《昭文新报》。该报刊于1873年8月（清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其资金来源、经办人身份与外报不同，由艾小梅个人独资经营，纯属中国民人自办。而在经营方式、形式内容方面，又与封建“邸报”相异，它面向社会广大民众，“每日发行，遍售各埠”；版面“仿香港、上海之式”，十折小型，四六版，活字木刻印刷；以刊发“奇闻轶事”、“诗词杂作”为主要内容，与专载上谕、奏折之类的官门抄和专供官吏阅读的公文命令录旨趣大异，是一种“向无此举”、“完全翻

新”、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闻企业，因此成为国人自办日报而“开其先路”的最早的一份民报。

第二，湖北是革命报刊丛集之所。在近代，由革命党人和革命团体所控制、主办的报刊，其数量之多，湖北居于前列，为大多数省份所不及。撇开湖北留日志士在东京所设报刊以外，从1905年开始，革命党人不断出任外报、教会报主笔，如张汉杰等任英商中文《楚报》主笔，刘静庵编辑《文华学界》，借机宣传革命。1908年以后开始主办报刊，如李亚东、陈少武办的《通俗白话报》，姜旭溟、饶翼儒办的《江汉日报》，群治学社的《汉口商务报》，振武学社的《大江白话报》，文学社的《大江报》，共进会的《湖北日报》、《雄风报》，还有回国留日志士的《夏报》、《湖北女学日报》等等，革命团体几乎都掌握有自己的舆论机关。这些报刊都有明确的宣传对象和政治目的，面向新军基层官兵和进步学生，在新军各标营中建立“通讯网”、聘请“特约通讯员”、设立报纸分销处、免费赠送“义务报”。报纸优先刊发军中通讯，尽情揭露官厅黑幕和军中不法情事，借以灌输革命思想，宣传种族主义，鼓动“结团”反清。武昌起义时，新军迅速瓦解，转化成为革命力量，首义一举成功。论功行赏，“报馆之功不可没”。民国初年，革命报纸如雨后春笋，竞相创立，已如前述。这些报纸尽管屡遭查禁，但此伏彼起，始终站在讨袁的前列，战斗不息。

第三，湖北又是公开呼号以“大乱”救中国的舆论制造所。1911年，当反动的清政府残酷镇压黄花岗起义、全国笼罩着一片失败情绪的关键时刻，《大江报》不顾安危，刊发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奋起疾呼：“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①“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魂梦，亡国奴之官衙，行见人人欢然承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

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此论一出，有如一顆精粹原子彈，震山撼岳，全国景从，在革命狂飆的摧毁下，终于将清王朝推倒。

在此前后，其他革命报纸也大声呐喊，如《江汉日报》于1908年大胆译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所刊《清国之革命党》、《立宪党与革命党》，极力赞颂革命党“法欧美之学说，倒现在之政府，建社会民主政体，……且直以武力而期成功”。称誉孙中山等为“革命党之急先锋”。《大江报》于1912年刊发《论社会主义定义十五条》，传播“社会主义”学说，讴歌财富公有。汉口《民报》于1916年鼓吹以武力“超度”万恶世界，以“大乱”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如此等等，都是值得称道的著名篇章，它有如木铎金鼓，振聋发聩，催人觉醒；又有如宝刀利剑，字字铿锵，令敌胆寒。

第四，湖北又是摧残舆论、实行文化专制统治最为严厉的地区。三度督鄂，统治湖北长达十六七年之久的张之洞，素享开明官僚、洋务重臣之誉，所办洋务新政，卓著成效，在文化思想上亦以鼓吹“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名噪一世，这种在维护君权的基本原则下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一直成为清政府统治文化的指导思想。在湖北，他率先提倡“阅报”，明令下属订阅，允准国人办报，颇受称道。但他统治舆论的手腕和对报刊的钳制，亦为各省督抚所难企及。19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地方督抚的张之洞，一直起着新闻检查官的作用，对进入湖北的维新报刊，都亲自审阅，凡认为有损君权、危及封建统治的言论，即以“变乱是非”、“妄发议论”相指责，动辄上书指控。经其指驳的报刊多达十余种，如上海的《时务报》、《新闻报》、《苏报》、《沪报》、《中外日报》，天津的《国闻报》，四川的《蜀学报》、

湖南的《湘学新报》、《湘报》，湖北的《汉报》等等。他还主办《正学报》、《湖北官报》、《两湖官报》以抵制进步舆论，亲自审订出版原则和内容，规定以“正心术，止流说”为宗旨，“凡邪说悖乱之说，猥鄙偏谬之谈，一概不录”，还特辟“辩正谬误”专栏，用以批判进步言论。所有这些别出心裁的举措，大大强化了官报的职能，成为各地官报之张本，多所效法。1900年，为讨好慈禧太后，公然下令：凡登载“悖逆”字句之外省报纸、汉口华界租界各报，一律禁止购阅和递送；封禁华界所有报馆，禁阻续开报馆。这种对报刊全面查禁的严厉举措，亦为他省所少见。1905年以后，民报勃兴，张之洞及其继任者陈夔龙、端方、瑞澂等更是肆意摧残，动辄扣上“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查封报馆，捕捉主笔。在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革命报刊大多出版一年半载即遭摧折，能够维持二年三年者可谓凤毛麟角。如《江汉日报》因刊发康有为代草的《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要求立开国会、撤帘归政而开罪当局，出版半年即被查封。《湖北日报》因登载《石龙》、《怪物图》两诗画，微讽陈夔龙、张彪而得祸，立捕主编、作者入狱。《扬子江白话报》因揭露江汉关监督陶某之子与英人争风吃醋事，将主笔打入县牢。《汉口商务报》因反对铁路“国有”、《大江白话报》因揭露英国巡捕残杀人力车夫，均被勒令停刊。《鄂报》因更改报名，未缴“保证金”，当局即以“违律取巧”而勒令闭馆。《大江报》因鼓吹“大乱”，酿成“大江报案”，詹大悲、何海鸣险遭不测。

民国成立以后，黎元洪统治湖北，对舆论的控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以讨袁为职志的汉口《民报》，出版仅12日即遭查封。《讨报》以命名触忌，被勒令停刊。《大江报》因宣传“社会主义”被禁止出版，《民心报》因声援《大江报》而受株连。